

叙土关系危机探源

王 新 刚

1998年10月20日,叙利亚、土耳其两国达成安全协议。至此,突发于1998年9月30日并持续数周的叙土关系危机暂告结束。此次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由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因素,叙土关系经历了紧张与缓和、冲突与合作的历史过程。

一、国际背景下叙土关系基本态势

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变幻莫测的中东国际政治、东西方阵营在中东地区的激烈角逐以及叙土两国建立在本国政治、经济、特别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取向从宏观上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

首先,阿以冲突是中东政治的核心。在反以阵线中,叙利亚是中东地区最强硬、最坚定的国家。作为前线国家,近半个世纪中,叙利亚国家安全长期面临严峻挑战;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的心脏”¹,叙利亚矢志不渝地捍卫着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公开承认致使叙土关系在初始阶段就失去了建立良好关系的地区国际政治基础。此后,阿以冲突及其和平进程始终是双边关系或紧张或合作的焦点之一。

其次,在冷战时期,叙土两国分别或靠近或进入尖锐对峙的两大阵营。土耳其长期奉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结盟的外交政策,加入北约,并积极努力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叙利亚自50年代中期以后与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关系,与东方集团结成战略联盟。这一关系持续至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

因此,中东时局的起伏、东西方冷战态势的演变对叙土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时期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局部利益变化,两国关系也出现了与总体国际政治走势逆向发展的现象,驱动这一现象的因素也是各自国家利益的变动与调整。因此,在全球及地区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叙土关系呈现出紧张与缓和、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基本态势。

40年代末,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公开承认引起了叙利亚的强烈不满。但时隔不久,1949年政变上台的胡斯尼·扎伊姆政府在叙国内推行反共、反苏政策,叙土关系迅速升温。然而1954年当叙利亚发生新的政变后,叙土双边关系又趋冷淡。1955年双方政府着手谈判叙利亚加入巴格达条约问题时,崛起中的叙国内左派力量反对谈判的浪潮迫使谈判流产。1956年后,苏联势力进入中东,叙利亚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等左派力量受到鼓舞。此后,叙利亚与埃及结盟建立“阿联”,并接受苏联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土耳其认为由于苏联势力的渗入、“阿联”的建立以及1958年巴格达条约的破产,叙利亚已成为土耳其南部的重要威胁。1957年4月,土耳其借口叙利亚介入约旦国内政治动乱,在土叙边界集结重兵。8月,双方发生冲突,土方再次增兵;叙方则发布动员令并向联合国

¹ 独立前,叙利亚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及其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巨大影响;独立后,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促使叙利亚人深信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的心脏”。

控告土耳其。苏联同时向土耳其发出警告。在多方调解下,土军撤离边界地区,持续数月的土叙关系危机暂告缓解。土耳其对“阿联”怀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阿联”抑制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的扩展;另一方面对“阿联”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反西方的外交政策深感不安。1961年叙利亚宣布退出“阿联”时,土耳其迅速予以承认,是继约旦之后第二个给予公开承认的国家。

60年代叙土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1961年9月“阿联”解体,土耳其以此为契机首先向叙方伸出橄榄枝。然而叙利亚国内政治动荡,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力量的壮大,脆弱的叙利亚议会制政府于1963年3月被倡导阿拉伯统一、社会主义和与苏联东方集团合作的复兴党政府所取代,土耳其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未果。1966年激进的贾迪德复兴党政府组成后,在外交上进一步向苏联靠拢。而土耳其自60年代初以来,一系列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促使它调整对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外交政策。首先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危机缓解的条件之一是美国和北约撤出设在土耳其的北约导弹。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在继续保持与西方密切关系的同时,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其次,1963年11月塞浦路斯宪法危机引发的希腊、土耳其两族冲突在60年代中后期不断加剧。土耳其的西方盟友支持马卡里奥斯(希族)中央政府,反对土耳其介入希土两族争端。为了赢得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土耳其力求改善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作为穆斯林的土耳其民族及阿拉伯国家的近邻,土耳其国内民众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呼声日趋高涨。在国际国内因素促使下,土政府对阿以冲突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六·五”战争中,土耳其政府第一次公开表示它将奉行中立立场,并且赞成国际社会提出的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的主张。“六·五”战争前夕,土外长就曾向

阿拉伯国家驻安卡拉大使们郑重宣布:“土耳其对阿拉伯国家不采取敌视态度,不允许北约利用土耳其军事基地打击阿拉伯人”。土外长向叙利亚作出特别保证:土耳其无意在土叙边界增兵。战争期间土耳其向叙利亚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对此作出积极反应,1967年8月24日叙外长发表谈话称:“叙利亚人民赞赏和感激土耳其在危机期间在联合国内外对阿拉伯人的支持。土耳其对阿拉伯正义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消除(以色列)侵略造成的后果,并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¹

但是,1970年以前土耳其对阿政策的调整虽然缓和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并未引起叙利亚对土耳其政策的实质性变化。60年代后期尽管双边关系在国际背景下走向缓和,然而激进的叙利亚贾迪德政府不断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继续支持不结盟的塞浦路斯马卡里奥斯政府,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坚持反对土耳其的立场。究其原因,一方面叙土两国之间存在着大量久拖不决的悬案;另一方面在严峻的东西方冷战中,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总体上追随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令激进的贾迪德政府深怀疑惧。

进入70年代,叙土关系从缓和走向合作。70年代初美苏两霸推行“缓和”政策,为叙土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国际政治空间。从叙方看,1970年阿萨德总统执政后叙利亚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在继续改善与发展同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关系和加强与苏联合作的同时,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十月战争”后叙利亚与美国复交,接受基辛格的穿梭斡旋,并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叙。阿萨德总统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使叙土关系从缓和走向

¹ Edited by Moshe Ma'oz and Avner Yaniv: Syria Under Assad—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Regional Risks, Croom Helm, London and Sydney, 1986, p. 88.

合作成为可能。而此时,土耳其对阿以冲突及“十月战争”的立场为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创作了条件。“十月战争”中,土耳其再次阻止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军事基地向以色列转运军事物资,并重申支持联合国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合法权利¹。土耳其对阿以冲突立场的进一步转变有诸多因素,其中重要的是塞浦路斯危机不断激化。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岛并控制全岛近40%的领土,最终造成希土两族分治局面。土耳其的军事介入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国、希腊等北约成员国对此极为不满。为了摆脱外交上的不利处境,土耳其极力谋求伊斯兰及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在上述背景下,叙土关系进入了新阶段。1972年土耳其外长首先访叙,两国外长会谈几乎涉及双边关系的所有领域,签订了贸易、运输、航空、旅游等协议。叙外长宣布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与主权,强调应在希土两族权利均得到尊重的前提下解决希土两族争端。1973年7月叙外长回访安卡拉,双方就继续进行高层接触达成共识。1974至1975年双方外长再次实现互访。

70年代中后期叙土关系出现新的阴影。1975年6月叙利亚邀请马卡里奥斯总统访叙招致土方不悦。土耳其对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内战持反对立场。1977年叙利亚关闭连接土耳其、伊拉克的铁路,土耳其更为不满。70年代后期双方争执的另一个焦点是,叙利亚认为土耳其为反政府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提供保护;而土耳其认为叙利亚容忍土耳其无政府主义者在叙境内从事反政府活动。尽管如此,叙土关系并未受到严重损害。80年代初双方外长及副总理多次互访。1982年3月,时任土耳其副总理的厄扎尔访问大马士革,两国签订多项经济合作协定。同年8月叙副总理回访安卡拉。双方曾计划邀请对方国家元首进行互访,尽管计划未能实现,但合

作关系继续发展,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合作明显加强。此外,多项文化协定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交流旨在逐步消除两国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偏见与敌意。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12月签署的文化协定,该协定强调,双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删除教科书中相互敌视的内容。”

贯穿于中东国际政治的两伊战争和阿以和平进程对叙土关系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由于深陷于黎巴嫩内战,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对阿以和平进程持反对和消极态度,80年代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孤立。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分崩离析使叙利亚的外交处境日益险峻。叙利亚以海湾战争以及黎巴嫩内战结束为契机摆脱了孤立。土耳其周边安全环境虽因两伊战争等因素日益恶化,但1980年军人干政后组成的新政府对国内“存在伊斯兰化危险”更为警觉,对东南部库尔德人以及在叙伊(拉克)境内活动日益频繁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更为忧虑。加之80年代土耳其经济危机及其经济调整与改革,土耳其面临的内忧多于外患。因此,尽管叙土两国因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以及水源等问题引发的纠纷日益突出,但总体上80年代叙土关系在国际背景下尚能保持平稳态势。

90年代初,马德里中东和会后,阿以和平进程的重新启动为中东地区展现了和平的曙光。但是中东又出现了影响叙土两国关系的新变化。其中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迅速接近令叙利亚及阿拉伯国家不安。1994年3月,土以两国情报机构签订《安全与保密条约》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更令叙利亚及阿拉伯国家不安的是,1996年2月土以签署了4项军事及国防合作协议。1997年底在德黑兰举

¹ 前引书: Moshe Ma'oz and Avner Yaniv, p. 89.

² U·伊万诺夫:《近东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土耳其—阿拉伯关系及其地位(1945~1983)》,莫斯科,1983年版,第67~68页。

³ 同¹, p. 92.

行的第八届伊斯兰国家组织首脑会议上,叙利亚总统代表阿拉伯国家发言时猛烈抨击土以军事及国防协议。阿萨德总统指出,土以军事及国防合作协定是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尤其是针对叙利亚的,而且已经对叙利亚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阿萨德总统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家首脑特别是伊朗总统哈塔米的积极响应。¹至此,阿以问题再度成为影响叙土关系的地缘政治因素。但与以往不同的是,90年代阿以和平进程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时,其对抗烈度已大为缓解。曾经被阿以冲突掩盖的各种双边及多边矛盾日益凸现。在此背景下,叙土双边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逐渐减弱,双边因素随之上升并开始成为90年代叙土关系发展与演变的主导因素。尽管近半个世纪中,叙土关系在全球及地区政治因素影响下走过了紧张与缓和、冲突与合作的艰难历程,但双边关系中大量悬而未决的矛盾仍是双方发展正常关系难以摆脱的羁绊。

二、叙土领土与边界争端

领土争端是叙土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不久即得到土耳其的正式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外交关系的确立并未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历史纠葛,即亚力山大勒塔(土方称哈塔伊省)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委任统治者在原叙利亚地区设立若干半独立性地区政治实体,亚力山大勒塔是其中之一。二次大战前夕,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亚力山大勒塔制定地区宪法并实行自治。1939年在法土联合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和普选。由于人口结构因素,投票结果是亚力山大勒塔最终并入土耳其。²独立前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对此极为愤懑,独立后叙利亚历届政府均坚持对该地区拥有主权。

叙土两国拥有的835英里共同边界,是委任统治初期委任当局与凯末尔政府依《

桑条约》在作出部分调整背景下最终确定的。叙土双方对这条边界的划定均不满意。叙利亚独立后双方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纠纷的焦点是非法越境与边界两侧土地和不动产问题。由于边界的划定把许多村庄、部落甚至家庭分割在边界两侧,造成众多居民骨肉分离、家庭离散。70年代初期以前,所谓非法越境主要是被分割在边界两侧居民间的相互往来及过境耕作土地。50年代中期土耳其加入《巴格达条约》后,叙利亚严密控制边界地区库尔德部落的人员流动,甚至指控他们是土耳其间谍。1958年“阿联”建立初期,土耳其关闭边界达数月之久,严禁叙方在土境内拥有土地的居民越境耕作土地。1961年“阿联”解体不久,双方曾就非法越境问题达成妥协,同意向在对方拥有土地的居民发放通行证。60年代中期随着双方关系的缓和,非法越境不再成为困扰双边关系的严重障碍。即使在70年代中期,土耳其反政府组织越境活动日益频繁时双边关系也未受到严重损害。70年代后期非法越境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出现大规模走私、偷运武器和亚美尼亚人反政府恐怖主义活动。80年代中期厄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崛起取代了亚美尼亚人的恐怖主义活动,特别是其军事活动的日益频繁,自80年代中期后逐渐成为叙土关系不和的主要症结之一。

依据1923年6月的《洛桑条约》,边界两侧的土地及不动产似乎早有定论。《洛桑条约》规定边界两侧居民可根据种族及本人意愿选择国籍。选定国籍后保留对原住地不动产及土地的所有权。”然而现实中,土地与不动产时常成为两国争执的焦点。1954年首次

¹ Syria Times, December 11, 1997.

² 伊萨特·阿尔-努力斯:《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8页。

³ J.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1914~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9, p. 329.

为此发生争执。1958年9月“阿联”公布《土改法》后双方争执加剧。根据《土改法》，叙利亚地区政府没收了土耳其公民在叙利亚的土地。60年代中叙利亚推行更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土耳其被迫作出强烈反应。土耳其政府征用了哈塔伊省(叙方称亚力山大勒塔)所有属于叙利亚人的不动产。1969年1月土耳其外长威胁道，如不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土政府将把所有属于叙利亚人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在叙利亚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土耳其人。1970年初双方关系改善，叙土开始磋商财产补偿问题，并于1972年11月达成协议，同时设立特别委员会执行该协议。1983年双方就此再次签署新的备忘录。

三、恐怖主义及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6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局动荡，恐怖活动猖獗。1971年3月军人干预下组成的新政府指责叙利亚与恐怖主义有染，认为驻叙利亚巴解组织在叙支持下制造了1971年5月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被刺事件。70年代中期，巴解在安卡拉设立办事处，叙土两国因巴解活动引发的争执缓解。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库尔德人恐怖活动逐渐取代亚美尼亚人恐怖活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建立后，在叙、伊(拉克)等国设立营地，展开日益频繁的有组织越境袭击活动。

土耳其境内约有1500万库尔德人，占全国人口的1/6。由于长期推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策，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及权利，其语言及文化受到当局严格限制，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土耳其库尔德人与邻近国家库尔德民族长期以来渴望独立或自治。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建立武装组织后试图以武力达到上述目的。他们采取游击战术，袭击土军战略要地及设施，打击政府机构，枪杀军人、政府官员及帮助政府的平民。土军方则以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清剿政策予以回击。10多年来，共造成3

万余人丧生、10多万人受伤及800多亿美元的损失。

土耳其外交也因库尔德人问题受到影响。近年来由于政府不断加强武力围剿，库尔德工人党被迫改变“独立建国策略”，争取国际同情。他们以移民欧洲的库尔德裔人为基础，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上述努力颇见成效，不少欧洲国家已允许库尔德人设立库尔德办事处，有些国家官员甚至协助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建立“流亡国会”。1998年9月下旬，意大利国会议员邀请“库尔德流亡国会”人士到罗马集会，土耳其政府愤怒之下召回驻罗马大使。此前“库尔德流亡国会”也曾先后获准在俄罗斯、荷兰、挪威、奥地利及丹麦等国举行会议，因而导致土耳其与上述各国关系失和，使土耳其外交面临不利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1998年9月30日土耳其陆军总司令在巡视东南边界地区时抨击叙利亚，认为土军多年来围剿库尔德游击队迄今未能彻底歼灭，有证据表明是叙利亚从中作祟，因此必要时将对叙采取“强硬手段”。土耳其此时拿叙利亚开刀，一方面是对叙容留善待厄贾兰及其领导的工人党武装表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此举也是外交上避重就轻的策略：它既可对叙利亚等明里暗里支持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国家表明其立场、显示其决心，又可以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直接对抗。

90年代中，土以两国接近引起阿拉伯国家的焦虑，也使叙土关系日趋冷淡和恶化。叙利亚出于对土以两国结成军事联盟的不满，暗中加紧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此举深深击中了土耳其的痛处。在此背景下，历来对土耳其国家政治起主导作用的军方领导首先向叙利亚“发难”。土耳其总统、总理应声而和，相继发表声明，谴责叙利亚支持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有损于土耳其的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此次土叙危机实际上暴露出土耳其国内政界与军方的微妙关系。90年代中期以来，土军频出重拳以焦土政策重创库尔德武

装,但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在海外获得的声援却与日俱增,这使得曾3次发动政变并始终主导政局的军方人士对文官政府的现阶段外交活动十分不满。

四、水资源纠纷

水资源问题是叙土两国关系另一芥蒂所在。叙土两国间水源纠纷由来已久。早在50年代中期,叙土两国就曾因阿西河(又称奥伦河)水源分配发生过纠纷。阿西河是西亚地区著名的河流,其著名之处是,阿西河为西亚地区唯一一条由南向北流淌的河流。阿西河进入土耳其哈塔伊省后,转向西南注入地中海。1956年叙利亚开发卡巴谷地,在阿西河中游修筑大坝,为此土政府曾向叙方提出交涉。“阿联”时期,土政府提议双方举行会谈以便寻求包括阿西河、幼发拉底河水源分配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但遭“阿联”拒绝。60年代中期后,叙土两国先后在幼发拉底河修建水利灌溉工程。70年代中期,部分工程竣工,自此双方水源矛盾日见突出。80年代,两国加速开发水利资源,计划修建新的水利工程,其中土耳其阿塔图尔克大坝工程尤为庞大。该工程始建于1982年,造价41亿美元,90年代初竣工。然而,阿塔图尔克水坝工程只是“安纳托利亚东南工程”中的一部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工程”计划耗资560亿美元,预计2005年全部竣工。对叙利亚来说十分可怕的是,该工程一旦建成,进入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水量将永久性减少40%以上。90年代初,双方曾就水资源分配发生过激烈争执。1991年以来,双方多次就水源问题举行谈判,但均以陷入僵局而告终,即使达成一些临时性协议也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执行。因此,水源纠纷是叙土双方自80年代末以来关系不断冷淡且逐步恶化的主要芥蒂之一。由于库尔德人问题等夹杂其中,双方难以就此问题取得突破。90年代中期前后,土方官员就曾多次表示,只要叙利亚支持库尔德工人党,

土耳其就拒绝与叙重开水源问题谈判。

五、危机根源及叙土关系前景

此次叙土危机竟缘于土陆军司令一句抱怨叙利亚暗中庇护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的牢骚话。表面上看似令人费解,但在表相背后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与纷争。叙土关系的演变既与国际及地缘政治息息相关,又陷于双边关系中诸多悬而未决的羁绊之中。双边关系的紧张与冲突皆源于根深蒂固的历史纠葛及现实利益冲突;双边关系的缓和及合作是国际及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及双边利益的调整使然。冷战后的中东地区政治形势变化、阿以矛盾缓和、区域及双边矛盾上升是90年代叙土关系的地区政治背景。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以周边国家为基地开展反政府活动,是土耳其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及社会政治安定的肘腋之痛,土政府必除之而后快。叙利亚容留、善待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及领袖厄贾兰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此次危机的前兆则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签订《军事及国防协定》,时值阿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之际,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对此泰然处之,尤其是叙利亚更有腹背受敌之感。1998年8月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访问以色列时,土以两国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这使得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更加忧心忡忡。一些阿拉伯国家甚至怀疑,在美国的操纵下,土以两国显然有意结成军事战略联盟,这一联盟有可能把中东地区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时代,进而严重损害本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叙利亚斥责土以军事协定是“撒旦协议”。因此,叙土关系危机有其必然性。

叙土两国结怨日久,各种矛盾时隐时现。冷战时期双方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并存。后冷战时期双边关系的紧张局面逐渐取代缓和。究其根源,首先是东西方对抗格局制约本地区矛盾的因素消失后,中东地区区域及多边关系中和平与安全机制的确立尚遥遥无期。

因此, 多边及双边冲突与矛盾普遍上升。其次, 阿以和平进程的僵局潜伏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走和平之路是阿以双方的共识, 但激烈的讨价还价难以避免。叙利亚自马德里和会以来就一直对和平进程持消极态度。1995年内塔尼亚胡执政后, 以、叙和谈陷入僵局至今。当此敏感之时, 土以军事及国防合作不仅增添了以色列的谈判筹码, 使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处境, 且引起了包括伊朗在内所有本地区国家对其意图的高度警觉。第三, 结怨已久的双边关系致使两国缺乏建立良好关系的信任基础。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 不同时期矛盾的焦点不尽相同, 但是所有矛盾与冲突均未得到圆满解决, 因此一遇风吹草动, 双方便剑拔弩张。第四, 库尔德人问题是本地区仅次于阿以冲突的民族矛盾, 涉及诸多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安定。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是土耳其国内的心腹之患, 土军方在围剿境内分离主义分子的同时, 还依据1987年与伊拉克的协议越境追剿伊境内库尔德工人武装营地并颇有所获。但是土耳其军方却对叙境内库尔德游击队奈何不得。叙方的庇护是其根源所在。在军事手段难以奏效时, 选择外交手段既可改变外交困境又可通过向叙利亚“发难”, 震慑支持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国家。

叙土关系骤然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密切关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以阿拉伯世界代表身份紧急出面斡旋, 数次访问叙利亚和土耳其。在结束首次访土归来时他忧心忡忡地说: “中东地区再也经不起任何军事行动和武装冲突”。其后, 埃、叙、伊(朗)、土外长展开穿梭外交。1998年10月初阿盟发表声明, 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美国也对叙土间可能发生严

重冲突表示关注, 陪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巴以和谈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美国同叙土双方进行了积极接触, 将努力避免危机升级。俄罗斯对叙土争端深表关切, 认为叙土危机加剧将使原本就充满矛盾的中东局势更加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敦促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国防部长在危机爆发后不久宣布, 以色列将减少在以叙边界的军事行动及规模。危机期间, 叙土双方态度强硬, 在唇枪舌战的同时, 均向边界地区集结兵力, 但同时又都表示谈判的大门并未关死。经多方斡旋, 叙土双方终于在1998年10月20日签署安全协议。叙方同意停止支持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驱逐其领导人厄贾兰; 土方则宣布停止向边界集结军队。至此, 看似一触即发的叙土军事冲突及持续数周的危机暂告缓解。

此次危机中, 土耳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向叙利亚挑战, 其外交用意大于军事意图。土军方以武力相威胁, 以此显示其决心及实力, 同时, 也是对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无所作为表示不满。从危机过程看, 土耳其政府更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对叙利亚来说,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在与以色列仍处于敌对状态时, 如与土兵戎相见, 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然而安全协议的签订仅仅涉及厄贾兰及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双方大量悬而未决的争端均未涉及, 当然更不可能解决。因此, 危机的缓解仅仅是双方暂时的妥协, 双方改善关系依然困难重重。双方建立互信、互利的正常国家关系不仅尚待时日, 甚至不排除再度爆发危机的可能。

(本文作者王新刚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职博士研究生)

OSLO AGREEMENT AND OSLO SPIRIT – PEACE TALKS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 Oslo Agreement is a breakthrough of great historic significanc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nd a milestone for solving the Palestinian issue. It indicates that th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nations have ended (at least in the Agreement) the long-term state of antagonism and have decided to solve their disputes by political means; and that the two nations have accepted the reality that they must co-exist in Palestine; the Agreement has enabled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o make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restoring their legal national rights. The Oslo Agreement demonstrates the spirit of flexibility, pragmatism and mutual reconciliation on both sides of Palestine and Israel, opening up the 'Oslo space'—a new space of political actions, i. e., direct and open contact between them. And in this face-to-face 'Oslo space', the rule of game for itself has been fixed: both Palestine and Israel have been abstracted to be two political entities with equitable status and will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political negotiations. (Xu Xiangqun)

A LOOK INTO THE ORIGIN OF SYRIA-TURKEY RELATIONSHIP CRISIS

On October 20, 1998, Syria and Turkey reached a security agreement, thus ending temporarily the Syria-Turkey relationship crisis which broke out abruptly on November 30, 1998 and lasted for several weeks. The crisis was a reflection of conflict and rivalry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The evolution of Syria-Turkey relationship has been on the one hand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geopolitics, and on the other deeply entangled in many unresolved trammels concerning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such as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water resource dispute and the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 issue.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Middle East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and bilateral contradiction all constitute the regional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Syria-Turkey relations in the 1990s. The direct blasting fuse of the crisis however is that the anti-government activities of Turkey's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carried out from its bases in surrounding countries have threatened Turkey's national unification,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Syria's accommodation and well-treatment of the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and its leader Abdullha Ocalan has made Turkey deeply resentful. (Wang Xingang)